

绪论

本绪论将对我们的研究作一总结，并介绍本书的内容以及各种术语的含义。文中所引的论著一律列在附于地图及解说之后的“引用论著”中(pp.270-272)。

A. 分析法

1. 词形的分类

词形的分类是画地图的前提。这一工作首先按照共时上的特征进行，但分类的结果往往因工作人的观点而异。有一个经验是，如在地图上呈现出整齐的分布格局，则说明该分类方案是成功的。在我们的信息软件系统(PHD System)中，分类的结果同时反映在地图上，我们利用这一优势，可将分类的结果反复修改。

我们知道，词形的分类最有效的方法是以词素为单位的分析(morpheme based analysis)，参见岩田(1989)。有不少条目将词形分析为前后两种成份，才呈现出整齐的分布格局。前后两种成份的叫法按条目有所不同，前一成份有“前缀”、“前置成份”、“修饰成份”、“限定语”等叫法，后一成份有“词根”、“中心语”、“非首位成份”、“末位成份”等叫法，编者未统一起来，是因为词形的结构因条目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有些条目出现不少词源未详的多音节词，有时以语音特征能归纳出类别。一般来说，声母比较稳定，按每一词素声母的种类及其排列进行分类，能够表现出整齐的分布格局，如地图 40-3、4(膝)、49(结构助词“的”)等均如此。与声母相比，韵母和声调易发生变化。按韵母(如元音开口度的大小)的分类，目前唯有地图 42-3(肚脐)能描绘出有意义的分布格局。

2. 所指地图

有些条目通过分析词形和词义的关系能够画出有意义的地图。地图 43-1(疟疾)是根据词义将所有词形分成五大类。这种分类之所以能成立，是因为疟疾的说法富有多音节的描写性词形。其他条目中也有根据词义进行分类的，但其对象限于部分词形，如地图 37-1(踝子骨)。

方言中常常出现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某一词形的所指因方言不同而有差异。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就结合两个以上的条目画出一幅“所指地图”，如地图 8(“早上”义语词的所指)、10(“夜”义语词的所指)、24-4(“山药”的所指)、29(“大豆”和“小豆”的所指)。这种分析法见于俄国学者 E. Astrakhan 以及笔者的著作中(Astrakhan, et al. 1985, Zavjalova and Astrakhan 1998, Iwata 2000)。画地图软件 Wonderland 可以从语言信息库里同时索取两种以上条目的信息，我们利用这一特点绘制了所指地图。

所指地图表现的是词义的转移或转用现象，即某一词形的所指历史上转移或转用到另一种所指(参见下文 E-4 节)。这种变化也能发生在某一词素上。譬如，“膀”这一词素在方言中至少用来表示三种肢体部分(包括鸟类的)：胳膊、肩膀和翅膀；又如，“拐”这一词素能指四种肢体部分：踝子骨、胳膊肘、颧骨和孤拐(即脚腕两旁突起的部分)，参见地图 36 和 38。我们暂以“词族”(word family)这一名称概括这种现象，其含义当然与历史语言学所说的“词族”不同。某一词素能构成一个词族是出于类化的作用，而在变化的过程中该词素的语义多数都虚化以致表示一个抽象的意义，如“拐”这一词素表示的是一个〈突起〉义。由类化作用产生的虚化现象有时也

会产生真正的词缀。如地图 41(前缀的*kak)表现的是来源不同的词素最终变成前缀的情况。

B. 方言的边界线和分布类型

1. 等言线和方言的边界

如有一个词形或语言特征(甲)与另一个词形或语言特征(乙)毗连分布,而于(甲)和(乙)接壤之点划出一条线,一般称之为“等言线”。等言线的画法有两种(项梦冰、曹晖 2005:62)。中国各地都能画出长短不同的无数的等言线,但如鸟瞰全国的方言,既有等言线密集的地区又有稀疏的地区,而在前一种地区往往存在“走向大致相仿的线形成的同言线束”,所谓“方言的边界线”就是“这种幅度相当宽的同言线束”(Grootaers 2003: 33-34)。

如某一地区与其周围地区为等言线束隔开,不妨认为那个地区形成了一个方言区。但方言分区实在很难确定,按照严格的标准能划分出来的方言区全中国可能只有一个闽语区,而其他方言区却不能只根据等言线束与周围地区隔开。目前我们的主要依据是《中国语言地图集》所示的方言分区,共有 10 个大方言区。值得注意的是,大方言区的交界地带总出现一个过渡性质很重的或者说异质的方言群,如处于官话和吴语交界的通泰方言(鲍明炜、王均 2002, 史皓元、石汝杰、顾黔 2006),处于官话、赣语和吴语交界的徽语(平田昌司主编 1998, 曹志耘 1996)、处于赣语、湘语和粤语交界的粤北土话(庄初升 2004)等。至于北方的晋语和南方的客家话,我们认为这两个方言自身就是在过渡地带出现的异质方言群,这一点有待于下文再论述。

2. 主要的方言边界线和分布类型

有关方言分区的各种问题姑且置之不论,这里指出几条在全国方言的分布上占重要位置的边界线,并归纳出几种主要的分布类型。

1) 南北对立: 淮河线和长江线

有一条一千公里长的等言线束(当然其幅度较宽),东自江苏东北角起始经过淮河及秦岭山脉一直延伸到甘肃。这一条边界线的发现应归功于俄国学者 Olga Zavjalova (Zavjalova 1983, Zavjalova and Astrakhan 1998)。她指出,这条方言边界线由几个规律性的语音特征构成:入声的有无及入声舒化所归的调类、声母/l/和/n/的区别、非低元音(主要是/a/系统)充当主元音时的韵尾/-n/和/-ŋ/的区别以及有关卷舌音声母的声母类型。按照她的看法,这是把官话方言一分为二——北部官话和南部官话——的分界线。按照《中国语言地图集》的分区,也就是划分为北部的中原官话、兰银官话和南部的江淮官话、西南官话的边界线。Zavjalova 将此边界线称作“黄河-渭河线”,所谓“黄河”是指黄河的旧河道。这种称法来自一个历史事实:12 世纪金和南宋对峙时期的国界定于这一线,而当时黄河的河道向南走,以致最后与淮河合流。其语言学上的意义,就是这些等言线的形成就是从这个分裂时期开始的。我们的词汇地图也支持这一假说,如地图 3(“冷”系的南限)、地图 9-1(“夜-”系和“昨-”系的分界)、地图 33-1(“胳膊-”的南限)等。这些等言线的形成很可能是在宋代以后。本书将“黄河-渭河线”改称为“淮河-秦岭线”。有时也简称“淮河线”,因为等言线的密度在东部淮河附近更高,而在西部秦岭、渭河附近较为稀疏。

另一条很重要的方言边界线称作“长江线”,这一条线的走向基本与长江一致,名副其实,但其长度远不如“淮河-秦岭线”那么长。这主要是西南地区(即湖北中西部、四川、贵州、云南)的方言有多数特征与长江以北地区一致的缘故。我们的词汇、语法地图含有不少构成“长江线”的等言线,如地图 33-1(胳膊:“手-”系的北限,参见曹志耘主编(2008)词汇卷图 68)、地图

39-1(腋：“nest, hollow”系和“location”系的分界)、地图 40-3(膝：“词根+头+X”系、“词根+X+头”系与其他系的分界)、地图 44-1(厨房：“房屋”系和“方位”系的分界)、地图 49(结构助词：T 系和 K 系的分界)。这些等言线的长度及走向互不一致，如地图 33-1 的胳膊义的词，等言线自长江下游一直延伸到长江上游，甚至在四川“手”系已经越过长江有扩大到四川北部的趋势，但在其他地图上等言线沿着长江延伸到其中游地区(安徽至湖北一带)以后转向南部地区(江西和湖南)，在那里通过。至于音韵特征，有关保留浊声母与否这一特征的等言线只在江苏南部至安徽的长江沿岸一带，并不延伸到其西边。

构成“长江线”的等言线，总的来说其起源较构成“淮河线”的等言线还要古老，可能多数是宋代以前形成的，但是这不等于说“长江线”这一方言边界线的起源比“淮河线”还要古老。方言边界的起源与等言线的历史不是一回事。有一个普遍的真理：等言线的位置是会移动的(贺登崧 2003: 96-98)。构成等言线的两种形式经过长期的斗争，其中的一个形式获得优势，而另一个就趋向劣势。就汉语方言来说，一般情况是，北方的形式处于优势，而南方的形式则处于劣势。当然也有南方的形式向北传播的例子，尤其突出的是明清时期江淮官话对京师地区的影响(这个问题有待于下文 C-3 节讨论)。但就近代以前的总体情况说还是北方占优势。所以说，现在构成“长江线”的等言线可能有一个时期曾位于“淮河线”附近。我们认为，“淮河线”的形成时期较“长江线”还早，可能起源于六朝的分裂时期，而“长江线”起源于唐代，必定与当时江南地区的大规模开发有关。

根据扬雄《方言》的记载，汉语方言在汉代以前的分布格局以“东西对立”为主轴，这主要是由于长江以南地区处于汉族人口稀疏的状态。扬雄《方言》言及频率最高的是西北地区的秦方言和长江流域的楚方言，这两大方言在“淮河-秦岭线”(指现在的那条分界线)的西部形成了一种南北对立。根据本书作者之一松江崇的研究(松江 2006)，“淮河-秦岭线”的东部(即淮河的中下游地区)已经开始形成较为显著的南北差异，但在其中部尚未形成显著的南北差异。全国方言的分布格局从“东西对立”转换为“南北对立”必定需要几百年的时间，自六朝时期开始酝酿，至唐代三百年之间定型。产生这种转换的社会条件是汉族人口自北向南的大规模迁移，这必定伴随着人流、物流的交通要道(包括运河)的建设，进而推进了方言自北向南的传播。但对方言边界线的形成直接有贡献的应为阻挡人流及物流的因素，即六朝分裂时期国界的设定以及唐代行政区划的设计。唐朝河南道与淮南道的道界正定于淮河。唐初“长江线”作为方言边界线的作用可能还不如“淮河线”那么强，但唐宋时期社会相对安定，由于行政界限定于长江，以致它作为方言边界线的作用不断地被加强。如，唐朝淮南道与江南道(东道和西道)的道界定于长江。

现代汉语方言地理分布格局的历史背景，至少相当部分能够用一个关键词说明，即“北方化”。其含义是历史上有很多北方起源的方言词越过淮河，甚至也越过长江南迁。Norman(1988: 182, 汉译本 1995: 162)提出的划分南北方言的 10 条标准，其中 8 条我们做过方言地图。地图显示：有三个条目，第三人称代词“他”与声母为 K 系的“渠”或“其”的分界、上面提到的结构助词 T 系和 K 系的分界、动词“站”与“倚”或“立”的分界，分别大致与长江线一致，参见曹志耘主编(2008)语法卷图 041、图 003 及词汇卷图 134。但有两个条目北方势力在长江线的东部越过长江侵入吴语区：表示动物性别的成份放在词根之前的“母鸡”型(与此对峙的是“鸡母”型)和表儿子义的“儿”或“儿子”(参见曹志耘主编(2008)语法卷图 076 及词汇卷图 052)。这种分布类型可以称作“北方方言江东侵入型”，是南北对立的一种变异。再者，如本书地图 45 所示，动词〈走〉义的“走”不仅突破了长江全线而且还深入进攻南方地区。类似情况还可以从本书所收的各种分布较为复杂的地图中窥见，兹不一一列举。

2) “长江”型

长江流域处于华北和华南的中间，在语言方面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是过渡性，二是创新性。前者的例子，如“家、间、江”等牙音二等字的声母，淮河以北的方言，除了山东半岛胶辽方言读[kia-]以外大部分都读[tɕia-]，长江以南方言多数都读[ka-]（韵母不一定是[a]，今简化示之），而长江流域的方言则具有两读：[tɕia-]和[ka-]，是所谓文白异读。

过渡性是在每个过渡地区的方言都能看到的，不仅仅是长江流域方言的特点。长江流域方言的特点在于其创新性质。如下所论，语言的创新也会在被关闭的地区内产生，但很少传播到外地。本书所说的“长江”型分布则与此不同，分布领域竟达一千多公里，自下游至上游形成连续性的分布。如地图 3 的“冰雹”和“雪雹”、地图 5 的“晚上”、地图 6、7、9、11-14 的“天”类时间词、地图 25-3(马铃薯)的“洋芋”类、地图 34-2(肘)的“拐”类、地图 42 的“肚脐眼”、地图 47 的“吃吃”型(即吃固体和喝液体都使用“吃”的类型)。

这些词形的历史根源，至少多数是较浅近的，也就是说，这一分布类型的形成是属于晚期的，与自明朝初期以来汉人在云南的大规模移民有关。不用说，长江在明代以前就是人流和物流的要道：沿岸的要地有港口，其腹地则形成了用于运输的陆路网。14 世纪开始的云南开发必定加强了这一交通要道的功能。这里要指出一个事实：河水总是从上游到下游的顺流，人和物资以船运为媒介的移动则是顺流和逆流都会有的，而语言特征沿着长江的移动却总是以逆流为主的。所有方言都会产生新词，云南等西南方言也不例外，但那里产生的新词顺流传播到长江下游的机会必定甚少。不可否认，表现出“长江”型的词形多数都是江淮起源的，尤其是以南京和扬州为中心的一带应是语言创新的发源地。这一地区也可以称作“南方的核心地区”。值得注意的是，江淮起源的词不一定都传播到西南地区，如“早上”（地图 4）一词的分布多数只限于江淮地区。

江淮起源的词有不少现在成了普通话的词汇，如“冰雹”、“早上”、“晚上”以及指定日子的“今天”、“明天”、“昨天”等时间词(按，“晴天”、“每天”、“春天”等有可能不是江淮起源的)。这些词在北方地区也有所分布，但较为零散。此乃标准语或权威方言的典型分布模式，但也会暗示江淮起源的一些词形有向北逆流的可能性，留待于下文 C-3 节再论及。

3) 古老“长江”型和“楚地”型

有些词形沿着长江分布，但在安徽或湖北东部转而向江西或湖南延伸，最后到达福建西部或广东。如地图 6(今天)，“今朝”这一词的分布大半集中在长江下游，而其主流在安徽和湖北的省界附近转向江西，向南迁移，最后到达福建西部及北部的山岳地带。请注意，在福建与此毗邻分布的“今旦”实际上与“今朝”同义。又如地图 35(肩膀)，含“膊”的词形(“膊头”或“肩膀”)虽然现在不形成连续性分布，但是过去很可能曾形成过以长江下游为起点、经过湖北东部转向湖南最后达到广东的连续性分布，后来其分布领域被北方传来的“肩膀”隔断。再者，表祖父义的词根“爷”除了在北方拥有广大的分布地域以外，还集中分布于长江下游地区和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岩田 1995)。这可能暗示着南方的“爷”也曾形成过连续性的分布，其形状多少类似“膊”的分布。

以上三例中，肩膀义的“膊”和祖父义的“爷”很可能是北方起源的词，历史上先抵达江淮地区，以后沿着长江西迁，然后经过湖南、广东向南迁移。今天义的“今朝”是由明天义的“明朝”类推所致(后天义和前天义的“后朝”和“前朝”仿此，参见地图 11、13)。从地图 7 可以看出，“明朝”的分布区域比“今朝”还要大，也分布于吴语地区。“明朝”可能是南方方言中保留下来的古词(参见地图 8 解说)。不管其起源或来历如何，以上三例暗示的是南方地区曾存在以长江下游为起点的语言传播之路，而其起源远早于 14 世纪云南开发以后形成的那条长江之路。

古老“长江”型分布还见于地图 5-1(晚上和夜里)。长江中下游地区有两种词,“晚上”和“夜里”,或者重叠分布,但总的来说“夜里”的分布地域较“晚上”靠南。这两个词可能都是江淮起源。“晚上”呈现出长江型分布,是新兴的词形,“夜里”的形成年代必定比它还要早。这二词叠加的地区则产生了词义的分工,兹不详述,请参见地图 5-2 解说。

另有一种分布类型看似长江型,但在江苏省境内却缺少分布。如外祖母义的“家婆”、“家家”等含“家”(其读音是[ka])的词形分布于自安徽至四川的长江流域,但在江苏境内则不存在(Iwata1995: 209)。类似例子见于地图 40-4(膝)中,即含“p-(l)”音节的后缀式混淆形式。这种分布类型的本质与上述长江型不同,而可能表现出长江中上游地区土著方言的独特性。这种分布格局,我们称之为“楚地”型。

4) 东西对立

现代汉语方言的分布格局以“南北对立”为主轴,但南北方言内部分别又可以分成两块。长江以南的方言分为东西两块,以自天目山至武夷山脉的一线为其界限,其西边有赣语和湘语,其东边则有吴语和闽语。粤语和客家语地区可以说是中立地带,现以三个肢体名称为例说明。

	西部(赣、湘)	粤	客家	东部(闽、吴)
地图 37-1(踝子骨)	螺蛳骨	脚眼	脚眼	骹目、脚目、脚眼
地图 39-2(腋)	肋下、胛下	膈肋-	肋下、胛下	膈肋-
地图 40-3(膝)	词根+头+X	词根+头+X	膝头	词根+X+头

指称膝的词形按照构词法分类(参见该地图解说)。西部方言“词根+头+X”中的 X 多数是后缀,如“膝头[ku]”,而东部方言“词根+X+头”中的 X 是“馒”、“腹”等实词,如“脚馒头”。同一方言内部也有差异,如膝义的词,闽南则取“词根+头+X”型构词法,如“骹头[u]”。这里不考虑这种差异,而从总体来看,粤语和客家语一方面表现出古老南方方言的特征,另一方面表现出西部方言的特征。

北方方言的东西对立以山西为界。地图 14 表大前天义的词,其首位成份北方西部取“外”,东部取“大”,而山西则与西部方言一致。地图 35(肩膀),北方西部说“胛骨”或“胛子”,东部说“肩膀(头)”或“膀子”,而山西则与东部方言一致。又如,表外祖父和外祖母义词的首位成份,北方西部取“外”,东部取“老”(“姥”),而山西虽然是“老”正在扩大势力的趋势,但是山西西部和南部有不少地点还保留“外”以及“姐”、“舅”等独特的形式(据曹志耘主编(2008)词汇卷图 044 和图 045)。

北方方言的东西对立或许一定程度上应该归因于扬雄《方言》时代定型的分布模式,但可能大部分是由后起的因素决定的。北方西部分布的词形有不少来自南方或长江流域的方言,经过四川北部及陕南地区传播过来。其直接的证据是上述胳膊义的“手-”以及“鸡母”式的构词法,这两种特征在长江上游地区有往北扩大其势力的趋势。地图 40-1(疟疾)和地图 24-1(马铃薯),“摆子”和“洋-”类(主要是“洋芋”和“洋番芋”)既在长江流域拥有颇为广大的分布地域,又集中分布在西北地区以及山西,而在北方东部很少有“摆子”和“洋-”类的分布。

晋语在北方方言中是较为异质的方言群。上述几例说明,晋语在有些特征上与东部方言一致,而在有些特征上却与西部一致,也有一种情况是晋语内部夹杂着东西两方言的特征。此外,晋语也具有它独自的特征,如诸家所指出。地图 40-3(膝盖)显示,“前缀+词根+头/盖”式的构词法出现在长江流域以及西北地区(如“[kʰəʔ]膝头”、“[kʰə]膝盖”等),晋语也取这类构词法,而与东部方言分道扬镳了。但是晋语所取的前缀是[kəʔ],而不是[kʰəʔ]。这必定是存古的特征,详见地图 40-4 解说。一般认为,晋语的独特性可归因于其地形的封闭性(侯精一 1989)。这确实道出了真

理，但也要指出另一个事实，即山西的方言从四面都受到压力。过渡方言有时会表现出创新的一面，有时也表现出存古的一面，这是一个多少带有普遍性的倾向。过渡性的特征、创新和存古这三个特点晋语都具备，只是晋语自己产生的独有的特征较少扩散到其周围地区，这正是被封闭的地区所表现出的一个特性，也是与江淮方言不同的特性。

南方的客家语所处环境类似于晋语，一则是处于南方东西对立的过渡地带，二则是客家人的居住地原来多数都在被封闭的地区。过渡性的特征、创新和存古这三种特点客家话也都具备。就词汇说，双音节形式“膝头”的使用可以视为存古，指儿子的词或说“子”或说“lai tɕi”，前者是存古而后者则是创新。Norman 提出的一个假说是：客家语的底层是南方的古老方言(Norman 1988, 1989)。对于这一观点，我们基本支持。

C. 方言词的传播以及传播的路线

1. 方言词的传播

语言地理学的一种前提性的常识是：“词语是会走路的”(Words can travel)。其实词语本身不会走路，这一比喻的含义是词语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际而移动。方言词或语言特征在地理上的移动总称为“传播”。上文指出，等言线的位置是会移动的，这是词语走路的一个表现形态。如原来位于淮河线的等言线几百年之间逐渐向南移动，最后抵达长江沿岸。

方言词传播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徒步式”，二是“空运式”。前者是在过去各种传播媒介尚未发达的农村社会里最普遍的传播手段，即方言词由某一个村经过村民的交际传播到与之毗邻的另一个村。这种传播当然速度很慢。有位日本语言学者曾将日语的方言分布和历史文献记录结合起来测量过词语传播的速度(德川1993: 391-412)。其结果是：(1)传播的平均速度因词汇、地区而异，但每年的平均传播速度是0.93公里，(2)词形的产生时代越早传播速度越慢，反之，产生时代越晚传播速度越快(参见井上2003, 2009)。

古乐府《木兰诗》的主人公木兰很可能是北方人，她称呼父母为“爷”和“娘”(原文写作“耶”和“孃”)。¹ 称母亲为“娘”的北方方言仍不少，但称父亲为“爷”的方言在淮河以北地区已经少见(俞敏1984)。在现代方言中，指称父亲的“爷”拥有广大的连续分布领域的是江西、湖南两省以及福建西部。这不外是木兰所用过的“爷”经过几百年的时间到达这一带的结果。“爷”在北方地区为何消失了？其实并未消失。后世的变化致使这个词根转移到伯父的地位。“爷”的传播很可能经过南方的核心地区，即江淮，但指称父亲的“爷”除了其北部以外都不见了。这是由于在江淮地区“爷”的所指转移到了叔父的地位去了。北方及江淮地区所发生的所指转移现象必定与亲属称谓词使用的某种民俗有关。有关“爷”的讨论参见岩田(1988)和Iwata(2000)。

“徒步式”的传播如有促进传播的非语言学条件，传播的速度则会快一些，如大河(包括运河)、以大城市为枢纽发达的干线道路(国道等)等的存在。这种传播的方式也不妨称作“车运式”或“船运式”。上文指出了长江作为方言传播通道的重要性。这种“船运式”传播的速度较快，所以像马铃薯这种 17 世纪才带进中国的栽培植物，“洋-”类词形也已经形成了“长江”型分布，其势

¹ 《木兰诗》一般认为是六朝时期的作品，但有的学者认为是唐代的作品。又，“爷”(“耶”)早有晋代民歌的用例：“欢来不徐徐，阳窗都锐户。耶口(《乐府》作婆)尚未眠，肝心如椎橹。”(《晋诗》卷十九“清商曲辞”《欢闻变歌六首》之二，1050)以上承汪维辉先生指教。

力甚至也扩大到了西北地区(参见地图 24-1)。另外,一般认为河流和高山是语言传播的障碍,但有时也会促进语言的传播,故渡口和山口往往作为语言传播上的枢纽起作用(Dauzat 1922: 158-162; Grootaers 2003: 72-73)。

“空运式”传播的媒体是移民。在六朝以前汉语方言移植到长江以南地区主要是早期移民之功。以后的历史上也屡次发生过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致使方言词由甲地飞到乙地。譬如,福建南平方言称膝(knee)为[po lo kai](参见地图40-3),这是明代驻留此地的北方军民带入的(Chen 1981)。中国各地存在的“方言岛”多数是由这种移民形成的。但是方言词传播更普遍的方式是“徒步式”,汉语方言的研究历来过于注重移民的因素而忽略“徒步”式的传播。这里强调指出,移民最多是方言分布形成上的诸种因素之一。迁入非汉族居住地区的移民,其语言一般都占优势,如云南的汉语方言。迁入无人之地的移民也会长期保留祖地的方言,如在中国各地保存下来的方言岛。但迁入的地方如是土著汉人已居住之地,结果多是,“经过两三代人后,新移入者的方言无疑与周围的方言完全同化了”(Grootaers 2003: 64),除非是军队等强势集团代替弱势土著人的场合(如上举南平)。上述指称父亲的“爷”先抵长江流域,然后很可能按照上文所说的“古老传播之路”传进了江西和湖南,而这一传播的主要媒体应为人与人之间的交际而不是移民,否则“爷”不会在那么广大的地区形成连续性分布。由移民传播的词一般形成的是零散的分布,除移民迁入非汉族居住地区的场合以外。

2. 传播的路线

方言词不是盲目传播的,它的旅行有采取一定的路线的倾向(Dauzat 1922: 156)。

1) 以江淮为起点的传播路线

总结以上所述,北方起源的词以“南方的核心地区”为起点向南放射,这一假说表现为如下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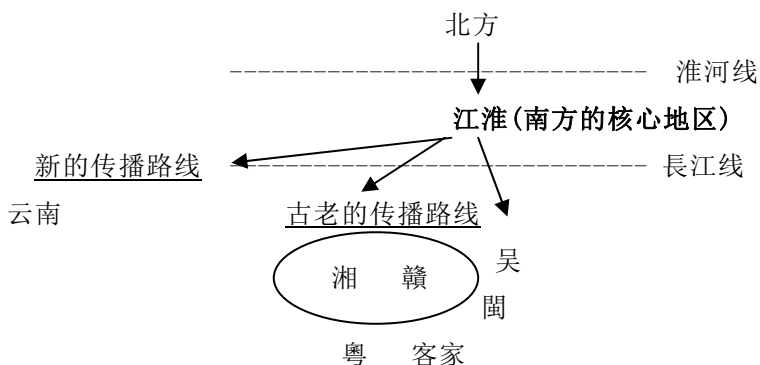


图 1

主要有三条传播的大道,均对华南地区的“北方化”颇有贡献。所谓“新的传播路线”主要于明代以后才开始起作用,表现在“长江型”分布的形成。宋元以前的传播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经过安徽和湖北的长江沿岸向湘赣地区扩散的,表现在“古老长江型”的形成,这里称作“古老的传播路线”;二是从南京、扬州一带直接向南侵入吴地的,表现在“北方方言江东侵入型”的形成。当然这些就大局而言的。“古老的传播路线”实际上包括两条支线:一是经过江西赣语区抵达福建西部山岳地带或广东客家地区的路线,二是经过湖南湘语区抵达岭南地区的路线。自江

淮直达吴地的路线，除了经过苏南的近道以外还有两条迂回的路线：一是自安徽东南部宁国一带越过天目山抵达杭州、绍兴一带的路线(参见地图 4-1、26-1, 2、36)，二是自安徽南部徽州地区沿着新安江经过浙江严州地区抵达金华地区的路线(参见地图 25-2、26-2)。

2) 北方的传播路线

在华北地区起重要作用的大道有二，一是大运河(京杭运河)，二是黄河，分别都包括其沿岸的干线道路。大运河沿岸自京师地区至徐州一带也是北方东部语言创新的枢纽，有很多新词产生于此。譬如，地图 1(太阳)的“爷”系词形、地图 11、12-2(后天、大后天)的“过明”、地图 40-3(膝)的“k-l-p”系统的词形(“胳拉拜”等)等都沿着大运河分布。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词的发源地可能不是北京。北京的土词往四围放射的例子看起来寥寥无几。

产生在北方东部的词形有时会沿着黄河传播到西部。从地图 40-3(膝)可以看出，“k-l-p”经过河南省的黄河沿岸传播到西北地区。值得注意的是，此词迂回而没传进山西去(岩田 2007a:128)。有些词形似乎是从西北逆流传进东部地区，也经过河南的黄河沿岸。地图 3-1(冰雹)的“冷子”可能就是这种例子。地图 43-1(疟疾)的“牛”类词形产生在河南及关中的黄河、渭河沿岸，然后转向淮河沿岸传播过去(参见下文 E-1 节的讨论)。

3. 近代时期江淮方言词的逆向传播

现对图1所示的传播模式略加补充。图1所说“新的传播路线”，即江淮方言词沿着长江向西的传播，是从“长江型”分布这一事实直接归纳出来的，其实有些地图暗示着近代以后，尤其是明代以后，以“南方的核心地区”为起点的语言放射传至北方。上文指出，“冰雹”、“早上”、“晚上”、“今天”、“明天”、“昨天”等普通话词很可能是江淮起源，但一定程度也分布在北方，尤其是以北京为中心的京师地区，我们认为多数是明代以后的逆向传播所致。²譬如，北京说“昨儿”、“昨几个”，但这种以“昨”开头的词在山西以东的除了东北地区以外的北方地区很少使用，而多数方言使用的是“夜来”、“夜里”、“夜几个”等以“夜”开头的词。北京及东北地区的“昨”类与其说是古词的保留也不如说是古词的“昨日”由“夜”类代替以后又从江淮地区经过大运河带进来的。凡这些词形在北方地区尚未扩大其势力，是北方的土词与之抵抗的缘故。但也会有江淮方言词顺利扩大其势力的场合。譬如，〈肚脐〉义的北方方言词应为“脖脐”(魏刚强2004)，是地图42-1, 2所说的“p-/m-脐”类。但从这两幅地图可以看出，带“肚”的词形分布在自河南至山西的北方中部，即“肚p-/m-脐”类；从地图也可以看出，带“眼”的词形分布在山东，即“p-/m-脐眼”类。我们认为，这些都是“肚脐眼”或“肚脐”逆流向北传播的见证，就是说，从长江流域向北传播的“肚脐(眼)”与北方的原有的“脖脐”冲突，致使“脖脐”或者前带“肚”或者后带“眼”。从“肚p-/m-脐”类多数不带“眼”这一事实看，向北传播的也可能是“肚脐”，那么，“肚p-/m-脐”类的产生应早于“肚脐眼”，可能是明代以前。不管变化的细节如何，肚脐一词的分布让我们要考虑到一种可能性，即其他词汇条目中也会有江淮方言词向北逆流，以致形成较为广大的分布领域的。³

² 这种推测间接地支持了鲁国尧(1985)提出的“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是当时的南京话”这一假说。

³ 这是作者通过与汪维辉先生的学术交流得来的观点。

D. 连续性分布的原则以及语言史的构拟

原来形成连续性分布的词形(或特征)A 后来被另一词形(或特征)B 隔断, 如此产生的分布格局如图 2 所示; 后来 B 的分布领域逐渐扩大的同时又被另一词形 C 隔断, 其结果如图 3 所示。这里圆圈表示某一调查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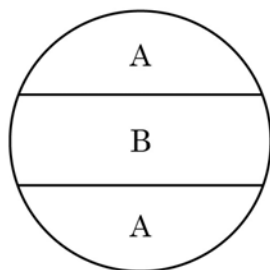


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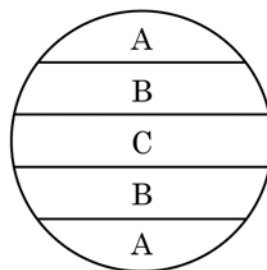


图 3

这种分布类型统称为“ABA 分布”, 是沿袭日本方言学传统的称法(柴田 1968)。如果图 2 的词形 B 或图 3 的词形 C 所处的地区在政治、经济及文化上优越于词形 A 或 B 的分布地区, 也就是说是一个核心地区, 那么 B 或 C 很可能是词形或特征的创新, 或是从地图外的某一地区传播进来的。

假如图 2 上的词形 B 及图 3 上的词形 B 和 C 没有向东西方向充分扩大其势力, 也会出现下面图 4 及图 5 所示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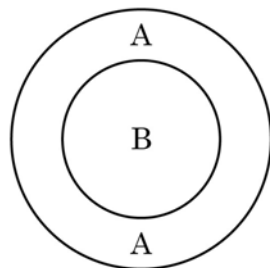


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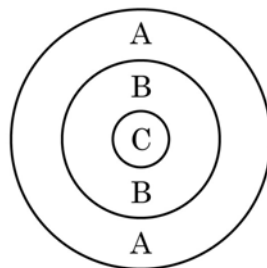


图 5

日本方言学界将这种分布类型称作“周圈分布”。此外, 假如词形 A 的分布领域被其他词形大大侵蚀以致只保存在互相远隔的两处, 本书将以“远隔分布”这一称法表现其分布格局(山口幸洋 1992)。

这些分布类型的形成出于一个原理, 即原来形成连续性分布的词领域被其他词侵蚀了。早期欧洲的方言学者称之为“连续性分布的原则”(principle of continuity)。其实类似的看法已于 19 世纪以前存在, 如图 4 和图 5 表示的情形正与那个有名的“波浪说”(wave theory)相同。

需要指出, “连续性分布的原则”不是铁则, 最好看做是一种倾向或趋势(Chambers and Trudgill 1980:183-184)。这里需要考虑两种因素。一是移民带进来的词形是这一原则的搅乱因素。假如“ABA 分布”中的词形 B 是由移民从别处带来的, A 古于 B 的假说就不能成立。另一种因素是, 远隔的两地也会不约而同地平行产生同一个或类似的词形。譬如, 北方“下雨”和南方“落

雨”的等言线大概位于长江线附近，但“落雨”也有少数例子出现在淮河以北的北方地区。⁴ 按理说，这也可能是古词的遗留。但是“落”这个动词也是北方人常用的，所以原来说“下雨”的人也会有机会想到说“落雨”。值得注意的是，北方使用“落雨”的方言，同时也使用“下雨”，即一点有两说。

因此，我们在将这一“原则”应用于地图的解释时必须谨慎。但是如能排除以上两种因素，我们则能依据这一原则来构拟出语言史。譬如，地图 7(明天)出现的“朝”系词形(“明朝”、“清朝”等)既在南方拥有广大的分布领域又在山西的若干点出现，呈现出“远隔分布”。“朝”这一词素是早上义的古词，我们根据地图 4 可知，它不仅分布在广东等南方地区，也分布在山东半岛的若干点，也呈现出“远隔分布”。但是“朝”这一词素在北方方言中已经被淘汰，其用途仅限于文言文。因此，山西及山东半岛的方言使用的“朝”不会是当地老百姓近世的创造，而应是古老特征的保留。据此也能进一步推测，明天义“明朝”的起源相当古老，与昨天义的“昨夜”成对，可能曾遍及全国，与另一种系统“明日”和“昨日”共存(地图 6 解说)。

E. 语言地理学的几种概念

方言词的变化纷繁复杂，但是其中存在某种规律性，而语言地理学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发现这种规律性。

1.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通俗词源

像“牛”、“马”之类的基本词汇全国一致，也就是说呈现出稳定性。这类词本书称作“无缘形”(unmotivated form)，意即形式与其所指之间没有任何关联。但是这些无缘形如带区别性别的词素，方言中则会出现种种词形，既有性别成份位置的异同又有其形式的多样性。这就说明，对农民的生活来说，重要的是具体的牛马，而不是那种抽象的牛马。

本书收录的方言地图多数都是方言词形种类繁多的词汇条目，其一个特点是变化总是趋向削减语言符号的任意性。这一过程可以称作“有缘化”(motivation)，而由此产生的形式则称作“有缘形”(motivated form)。有缘化的方式粗分为两种：一种是体系性的，一种是个别性的。前一种多见于取偏正(向心)结构的词。譬如，“今日”、“明日”、“昨日”等时间词由于具有共同的中心语，其任意性本来就较“牛”、“马”之类更低，而近代北方方言产生的变化是进一步的体系化，即“今日”、“明日”等的中心语最终被“儿”、“个”、“们”等后缀代替，不妨称之为“后缀化”(地图 6 解说)。表胳膊、肘、腋、膝等义的肢体名称原来都是取偏正结构或并列结构的双音节或三音节词，而后来其首位成份相互类化以致变成了前缀的[kak]，不妨称之为“前缀化”(地图 41 解说)。

至于个别性的变化，概率最高的是由“通俗词源”(folk-etymology)引起的变化，在方言的世界里甚至天天都会发生。河南、关中一带的方言称发疟疾为“放牛”或“赶牛”(地图 43-4)，浙江西南部的方言称膝为“猢猻头”(地图 40-1)，凡这些看起来荒唐的名称都是通俗词源的产物。但是这也不是盲目产生的，而是有一定的规律性。首先，应有名称与其所指在客观世界上的关联，如膝头似猢猻的头。其次，通俗词源的产生往往以语音的类似性为条件。譬如山西有一些方言将肘叫做“圪扭”(地图 34-2)，其词源很可能是“圪肘”。“扭”在词义上来自扭转、扭捏的扭，是

⁴ 如河北的唐山、邯郸、河南的原阳、济源、灵宝、陕西的紫阳、汉中等(据《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汇集》等资料)。

通俗词源，但从语音的角度看，这一变化只是一个声母的代替：*ʧiəu(肘)>niəu(扭)。

来源于一个词源而受通俗词源的影响变形的 A、B、C、D 等几种词形在地图上呈现出连续性的分布，我们称之为“推移型分布”。如地图 43-4(发疟疾)的“放牛”或“赶牛”，其名词部分在河南、关中一带变成“老牛”或“老犍”以后传至安徽西北部，进而在那里变成了“老张”，并且最终也抵达江苏境内，但在那里则变成了“老爷”。这些词的分布格局如下所示：

牛、老牛、老犍 | 老张 | 老爷

这种分布格局也见于喜鹊及蚕豆的地图中(参见地图 16-2 和地图 30)。

2. 趋向衰弱的词和牵引

西欧早期语言地理学家的一个基本思想是：由于语言内部的各种原因以及语言从外部受到的各种压力，词形或者变形或者缩短以致于趋向衰弱，而语言对这种状态采取各种治疗法以便恢复词语的生命力，是日叶龙(Jules Gilliéron)称之为“语言的病理学”(verbal pathology)或“语言的治疗学”(verbal therapeutics)的现象(参见 Dauzat 1922: 83-99)。中国北方方言自中古以来经历过很激烈的变化，从本书的各幅地图可以看出变化的面貌，总体来说情况与法国方言多少有些类似之处。

致使词语衰弱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语音变化。从中古音到现代北方方言的变化以剧烈的简化为其大特点，我们姑且认为《切韵》反映的是六朝至隋代的活的语音系统，其音节数目大约有现代北京音的两倍；如以慧琳《一切经音义》所反映的唐代长安音为基点，北京音的音节数目只有其一半以下。这种变化导致同音词增多，致使不少常用词从单音节变成双音节或三音节，以回避同音冲突。此乃属常识性的事实，但对词语的变化来说，有一种更重要的情况是由复音节词的增多带来的，即词重音(word accent)的发达。中古时期的双音节词重音可能以后强式为主，也许带“儿”、“子”等词尾的词已经趋向取前强式，但两种格式尚未形成音韵上的对立。唐宋以后的北方方言中前强式(trochee)日益发达，以致于与后强式(iamb)对立，前者现标作“强-弱”。至于三音节词，近代北方方言以“中-弱-强”式为主，但随着取“强-弱”式的双音节词不断增多，“强-弱-弱”式也越来越发达了，以致原取“中-弱-强”式的词有不少变成了“强-弱-弱”式。

词重音的发达导致含有弱化音节的常用词被其他词牵引的现象。

1) 类推牵引(analogical attraction)

偏正(向心)结构的词一般趋向于取前强式。上文指出，“今日”、“明日”、“昨日”等时间词由于都取一个中心语“日”，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原来较低。请注意，这里“日”这一词素的原义(即“太阳”)早就消失，而变成一种表“日子”(day)的标志了。近代北方方言中发达的前强式重音格式致使这个词素在语音、词义两方面更加弱化，此乃上文所说的“趋向衰弱的词语”，而这种词易于受到其他词形的牵引。好比由行星牵引的卫星总在一定的轨道上运行。这里发挥牵引作用的可能是“这一个”、“那一个”等三音节的指示代词，即现代北京话 zheige 和 neige 的前身。“今日”等时间词受此牵引以致带上了一个后缀“个”，即“今日个”、“明日个”、“夜来个”(即昨天义)等，在金元时期的文献中出现不少用例。这种变化，我们称之为“类推牵引”，因为这也是一种类推作用的结果。类推是产生语法化现象的一个重要的因素(石毓智、李讷 2001)。但时间词带上“个”尾这种变化，假如缺少某种动因，一般不会发生类推。应该说，有了指示代词的牵引，时间词才发生类推。凡接受这一作用的均为具一个共同中心语(head)的偏正(向心)结构词。“今日个”等三音节时间词的重音应为“中-弱-强”式，“个”虽然是后缀，但是读为强音节，趋向衰弱的时间词就这样得到了韵律节奏上的安定性。但对“日”这一词素来说，这一变

化可说是新的灾难：它由于处于“中-弱-强”式中的弱音节，弱化进行到底，先变成自成音节的“儿”[ər]，最终变成了融合音节中的一个附加成份，即“今儿个”[tɕiər kɤ]。也有些方言甚至丢失了“日”的任何痕迹，即“今个”。在这种变化过程中，其重音格式转变为“强-弱-弱”式，随之原读强音节的“个”变弱，但此词素的生命力颇强，在现代北方方言中仍占优势地位。

在现代北方方言中(包括江淮方言)，时间词也取其他的后缀：指昨天的“夜晚”在山东变成“夜们”(是人称代词的复数后缀)，指晚上或昨天的“夜来”在淮河以北的一些方言中变成“夜里”(是处所词后缀)，“早晌”和“晚晌”在江淮变成“早上”和“晚上”(是处所词后缀)，皆为类推牵引的作用所致，都以双音节词末位词素的弱化为变化的出发点(参见地图 8-10 的解说)。但与带“个”尾的时间词不同，这些均是原来的中心词素被后缀代替的例子，没发展成三音节词形。以上参见岩田(2007b)。

近代北方方言中滋生的三音节名词看来多数都取过“中-弱-强”式重音格式，而其中的弱音节后来发展成中缀的[l-]音节，如地图 17(蜗牛)、地图 39(腋)、地图 40(膝)都出现第二音节以[l]为开头的三音节形式，共时上可认做中缀。岩田(2007a)提出的一个假设是：指膝的 p-l-k 系统的三音节词来源于“[pak]膝盖”(其首位词素来自上述的前缀[kak])，后来其词根“膝”在“中-弱-强”式重音格式中弱化以致变成[l-]音节。现在有一些词共具这种[l-]音节，是出于同一个原理，也是衰弱的第二音节互相类化所致。对于带[l-]中缀的多音节词，看来仍有不少学者认为是上古汉语的遗留，基本沿袭清儒程瑶田《螺羸转语记》的思维方式。程瑶田无疑是清代杰出的语言学者，但现代的汉语方言学需要打破旧时词源学的框框。⁵

2) 类音牵引(paronymic attraction)

原来不具备任何共同成份的实词偶尔也会发生牵引，这必以一定程度的语音类似性为条件，我们称之为“类音牵引”。譬如，湖南、湖北、四川、贵州等中国西南部的广大地区，称苍蝇(fly)为“蚊子”，或取其前带修饰成份的词形(参见曹志耘主编 2008, 词汇卷图 038)。此乃“蝇”(*jiəŋ)被“蚊”(*vən)牵引所致。按，西南方言多数不区分/ə/之后的-n 和-ŋ。这是所指本身多少有共同性的例子，但是类音牵引也会发生于所指并无关联的两种词形之间。如，地图 16(喜鹊)的“麻尾鹊”[ma i tɕʰyΛʔ]等“麻”系词形明显受“蚂蚁”[ma i]的牵引；又如，地图 39(腋)的“胳膊窝”是受肘义词“胳膊”的牵引。但喜鹊与蚂蚁同属动物类，腋和肘同属人体。太田(2005, 2007)介绍了词义距离更远的一些例子，如“砚瓦”变成“阎王”或“阎王爷”，“星宿”变成“新媳妇”。诸如此类看似语言游戏的现象，的确是方言的世界里经常发生的。肚脐是人体，荸荠是植物，而在方言中表两者的词形往往相近，甚至同音。对此现象，魏钢强(2004)认为，“荸荠”之名来自本指肚脐的“脐脐”；荸荠因为和肚脐的形状相似而得名。我们则在地图 42(肚脐)的解说主张，这是类音牵引的产物，并不以词义为变化的条件。

类音牵引导致两种后果。一种是同音冲突的危机，但多数以添加某种成份回避冲突。如西南地区发生的类音牵引致使“蝇”与“蚊”同音，但前者前置“饭”等词素或者不添加任何前置成份，而后者多数前置“夜”、“长脚”、“叮”等成份，虽然也存在两者都称“蚊子”的方言，但多数方言在形式上有区别。另一种后果是一套词汇体系的形成。譬如，在山西和山东的一些方言“蝙蝠”、“壁虎”和“蚰蜒”(指蚂蚁)这三种动物的名称开始牵引以致共具一个成份[piɛ xu/fə]，但都以前加某种修饰成份保持区别(岩田 1996: 238-239)。

⁵ 李如龙(2007: 469)说，“以往为方言词考本字往往只注意历史音变造成的语音对应的例外，总是往韵书里去找相应的反切和义位，往古籍中找例句，关注共时音变造成的音、字脱钩比较少。”这一句正好说出本书的一个核心思想。

需要指出，以上诸例原来多数都取“强-弱”式重音格式，此乃方言产生变化的动因。也会有人主张，北方的“蝙蝠”、“壁虎”等词不一定取前强式。对此我们的回答是：词重音格式的选择是易于动摇、易于变化的，故一度变取前强式的词后来也会回归取后强式。事实证明，各方言有关词重音的对应关系不很整齐，与声韵母不相同，这是人类的耳朵对强弱的感知不敏感的缘故(岩田 1999: 156)。

3. 同音冲突与同义冲突

促进变化的因素既有方言内部的因素又有从外部带进来的压力(Dauzat 1922)。上文讨论的语音变化、牵引、通俗词源均属内在因素。外部压力主要由词语的传播带来。近年来有关“方言接触”的讨论有所增加，但在语言地理学的研究上这不过是属于常识的一个大前提。汉语方言的世界不妨叫做“方言接触的坩埚”。

由内在因素和外部压力产生的各种现象可以归纳为如下两大类型：

- (一) 同音冲突：为争夺一个形式而开展的两种意义(所指)之间的斗争
- (二) 同义冲突：为争夺一个意义(所指)而开展的两种形式之间的斗争

这两种类型分别包括三种斗争形态，将在下面一一叙述。下文中，P 和 Q 代表形式(或词形)，x 和 y 代表意义(或词义，或所指)，P(x)、Q(y)等代表由形式与意义构成的语言符号(或词语)，根据马濂(1992)所示的公式。箭头(→)标示压力所趋向的方向，大于号(>)标示变化。

1) 同音冲突(homonymic collision)

假定有词义不同而形式相同或近于相同的两个词，P(x)与 P(y)，处在发生同音冲突的危机中，其结局会有三种：

- a) 一个意义 x 得胜，而另一个意义 y 被击败或逃亡以致其形式被另一形式 Q 代替：

$$P(x) \rightarrow P(y) > P(x) / Q(y)$$

- b) 两个意义企图妥协，或者单纯共存，或者双方都改变形式：P1(x)/P2(y)

- c) 两个意义形成地理上的互补分布以回避冲突： $\boxed{P(x)P(y)}$

如一个意义强势而另一个相对比它弱，其结局一般是 a)，即胜者 x 占据 P 的地位，而败者 y 改其外貌，成为 Q。这里所谓强弱一般是由该意义的使用频率决定的。但有一批意义群似乎其力量永远最强。譬如，在中原官话地区有关入声的语音变化致使“笔”这个词要改变其外貌为[pi^{阴平}]，但这个位子已由那个臭名昭著的忌讳义占据，而在它的面前连“笔”这种使用频率很高的东西也只能低头降伏。故这次斗争的胜败是用不着说的。被打败的“笔”在山东西部及其周围的方言中最终改变其外貌为[pei^{阴平}]以求谋生(以上根据李荣 1994)。⁶我们在地图 21(臭虫)的解说中提出一个假说：这个忌讳词[pi^{阴平}]曾在北方方言中与臭虫义的词“虻”发生过同音冲突。

使用频率大致平衡的两种意义斗争时，其结局往往是 b)。譬如上举类音牵引之例的蚊子和苍蝇，使用频率大概相同，故假如都取一个形式“蚊子”，可能永远也不分胜败。其实，真有一些方言似乎是以“蚊子”既指蚊子又指苍蝇。但就多数方言而言，则是以前加修饰成份来保持区别。值得注意的是，同音冲突一般发生在属同一意义范畴或邻近范畴的词语之间。李荣(1994:162)指出，不易在相同环境里出现的两个词不必回避同音冲突。

⁶ 张燕来(2006:311)认为，“与忌讳字眼相同音韵地位的字多，忌讳字眼本身改读而同类字不改读”。如，西安话的“屎_{女阴}”改读[p^hi^{阴平}]，而“蓖逼笔碑毕”仍读[pi^{阴平}]。但西安按音律该读[p^hi^{阴平}]的字，“坯披”改其韵母为[ei]，“批劈”改其声调为上声(据《汉语方言字汇》第二版，73页)，可见忌讳字的威力相当强。张文指出，“忌讳字眼保持一个相对孤立的地位”。

同音冲突也会形成地理上的互补分布以回避冲突(马濂 1992, Iwata 2006)。如比较地图 45(走)和地图 46(跑),可以看出动词“走”的所指在地理上是基本互补的。又如地图 10,“夜来”和“夜里”这两种形式在长江流域至淮河一带用来表达〈晚上〉或〈夜里〉义,而在北方则表达〈昨天〉义。

同音冲突一般由方言内部的因素引起,如语音变化、类音牵引、所指的转移等,但也有由外部压力引起的同音冲突,将在下文第 4 节讨论。

2) 同义冲突(synonymic collision)

同义冲突多数都由从外部带进来的压力引起。假定某地分布着一个词 $P(x)$, 而某时从相邻地区传进来了与此同义的 $Q(x)$ 。其结局会有以下三种:

- a) 一个形式得胜, 而另一个形式消灭: $Q(x) \rightarrow P(x) >$ 消灭
- b) 两个形式企图妥协, 以致分担意义或其用法: $P(x1) / Q(x2)$
- c) 两个形式企图妥协, 以致产生混淆形式: $\{(P+Q) \div 2\}(x)$

如一个形式强势而另一个比它弱, 其结局多数是 a)。但与同音冲突不同, 同义冲突的胜败则多数取决于语言外的因素, 即上文 C-1 节(方言词的传播)所述的因素。虽然也会有非核心地区起源的词形由于其本身的魅力获得扩大势力的情形, 但是多数情况则不然。⁷

如果相邻分布的两种词形势均力敌, 同义冲突的结局往往是 b)或 c)。Iwata(2000:192)将 b)比作共时音位学的条件变体。如上述指称父亲的“爷”经过几百年的旅行到达长江沿岸的时候, 在那儿遇到的土词应为“爹”。“爷”和“爹”为了争取一个父亲的位子开始斗争, 但两者势力平衡而胜败难分。故两者企图妥协以致分担其用法: 新来的“爷”似乎作出让步, 占有了背称的地位, 而已有的“爹”仍用来当面称其父。这种现象绝不是特殊的, 其他语言中也有, 在汉语方言中更是常见的。应该指出, 所谓“文白异读”的本质不在于一个汉字的读音有两种或者更多, 而在于已有的词素 $P(x)$ 与新来的词素 $Q(x)$ 在一个方言中共存而分担其用法, 即白读用于某一批词, 而文读用于另一批词。处在斗争状态中的两种词形有时似乎无条件地共存于一个方言中, 这可以比作共时音位学的自由变体。文白异读也存在这种情况。

类型 c)在表面上与所谓紧缩词(blend form)相同。但紧缩词多见于新生事物的名称, 是出于创造新词的需要, 如产业革命时期的英国产生的 smog 是 smoke(抽烟)和 fog(云彩)的紧缩词。方言产生紧缩词的机理与此不同, 是相邻分布的两种词形互相接触的结果。如地图 6(今天)上出现的两个词“今儿天”和“今个天”, 从分布情况可以判断是紧缩词: 原来分布的分别是“今儿”和“今个”, 而新来的都是“今天”。这种例子也出现在其他条目的地图中, 如指疟疾的“半日子”可能是已有的“寒热”与新来的“摆子”接触而产生的通俗词源词(地图 43-3 解说)。指膝的词历史上曾产生过很多紧缩词, 参见地图 40-4 解说。这些例子都说明汉语方言在历史上经历过很激烈的方言接触。

由方言接触产生的紧缩词, 本书称之为“混淆形式”(contaminated form), 一则出于要与一般所说的紧缩词区别开来的用意, 二则是要主张这类紧缩词是一种“被污染形式”。“污染”是语言地理学的重要概念之一, 也包括由牵引、类推、通俗词源等因素产生的词形变化。

⁷ 上文 E-1 节言及的疟疾义“牛”类词形, 其发源地可能是河南及陕西的黄河流域, 而其后裔经过安徽抵达江苏, 由此“老爷”一词(前带“做”、“当”等动词)最终也侵入了江淮的大本营——南京和扬州。这是由于这个词形能够生动地表现出疟疾病人的形象缘故。另外, 乡下的方言词先夺取大城市周围的地区, 在其包围之下开始向市区进攻, 类似的例子在日本方言里也有(井上 2003)。

4. 所指的转移(referential shift)

所谓“转移”是指某一词形的所指发生变化的现象，从变化的结果看可以分为两种。

- a) $P(x) \rightarrow P(y) > P(x) / P(y)$: 词形 P 兼指 x 和 y。
- b) $Q(x) \rightarrow P(x) \rightarrow P(y) > Q(x) / P(y)$: 词形 P 专指 y，而所指 x 则由词形 Q 来表示。

第一种是所谓的“引申”。譬如“嘴”的所指从鸟嘴扩大到人嘴。下面讨论的是第二种情况，但当初也可能是引申，而后来 P(x) 由 Q(x) 代替。产生转移现象，其所指 x 和 y 必须是属于相邻语义范畴的。转移现象既有由内在原因产生的也有由外部压力产生的，下面分别讨论，但是均可以理解为同义冲突及同音冲突的表现形态。

(1) 由内因产生的转移现象

上文指出，“夜来”和“夜里”这两种形式形成地理上的互补分布以回避冲突：在长江流域至淮河一带用来表〈晚上〉或〈夜里〉义(下面统称〈晚上〉)，而在北方则表〈昨天〉义。此乃方言地图上反映出来的变化的结果，而对一个方言来说，这也就意味着同音冲突和同义冲突同时发生，如下所示：

$$Q(x) \quad \rightarrow \quad P(x) \quad \rightarrow \quad P(y)$$

黑夜〈晚上〉 → 夜来〈晚上〉 → 夜来〈昨天〉

这里 $Q(x) \rightarrow P(x)$ 是同义冲突，而 $P(x) \rightarrow P(y)$ 是同音冲突。这一变化可以有两种解释。第一种是，由于“夜来”的所指从〈晚上〉转移到了〈昨天〉，方言则以创造新词(即“黑夜”)来填补〈晚上〉义。这可以比作语音变化中的“拉链式”(pull chain)变化。另一种解释是，由于方言中新产生了〈晚上〉义的“黑夜”，已有的“夜来”受到它的压力，以致逃到〈昨天〉的地位去(地图 8、10)。这可以比作语音变化中的“推链式”(push chain)。汉语〈晚上〉和〈早上〉义的词总有转指〈昨天〉和〈明天〉的趋势，故更接近事实的可能是第一种解释。但不管如何，由这一变化带来的一个重要事实是，表〈昨天〉义的已有词(可能是“昨日”)由“夜来”代替，以致被驱逐出词汇体系。

(2) 由外因产生的转移现象

在词义上配对的两个词，现标之为 $P(x)/Q(y)$ ，这种和平共存有时也会被外来的因素搅乱。地图 29(“大豆”和“小豆”)表现的是这种情况。栽培植物的大豆在华北地区原来说“大豆”，是与“小豆”配对，但后来经过丝绸之路带来了蚕豆的新品种。这种蚕豆由于其豆粒比大豆大，以致占据了“大豆”的地位：

$$\text{大豆} \langle \text{大豆} \rangle / \text{小豆} \langle \text{小豆} \rangle > \text{大豆} \langle \text{蚕豆} \rangle / \text{小豆} \langle \text{小豆} \rangle$$

这也可以认为是〈大豆〉和〈蚕豆〉为了争夺一个形式[ta tou]开展的斗争，是一种同音冲突。被蚕豆夺取了其配偶的大豆，它再套上了“黄”、“白”、“黑”等花色的外衣。

下面再举两例，情况则与“大豆”不同，可以表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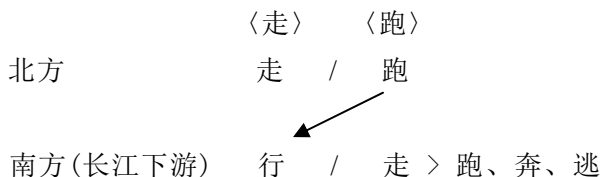
$$R(y) \rightarrow P(x)/Q(y) > R(x)/Q(y)$$

这里 R 是相邻地区方言的词形，原来指 y，传进本地区以后则变指 x。因此，对本地区方言来说，并没有任何所指的转移发生过。这种变化的本质是由方言接触而产生的同义冲突现象，下面两例均发生在南北方言互为角逐的地区。

1) 〈走〉和〈跑〉(地图 45、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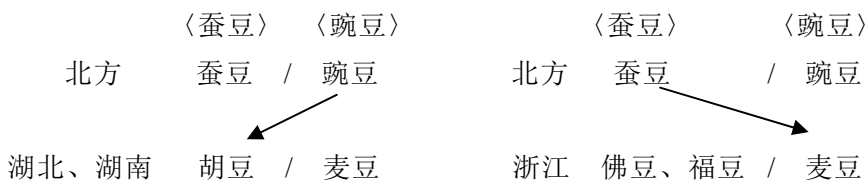
动词“走”的所指原为〈跑〉，与〈走〉义的“行”配对。众所周知，在北方方言中“走”的所指转为〈走〉，而〈跑〉义则由新词“跑”来填补。长江下游北部吴语地区原为“行/走”的领域，某一时期与来自北方的“走/跑”冲突，以致“跑”在那里变指〈走〉。这一变化的结果应为

“跑/走”，但现在已不存在这种体系，因为“走”由“跑”、“奔”、“逃”等代替。



2) 〈蚕豆〉和〈豌豆〉(地图 30-32)

首先指出一个语言外的事实，即在长江流域蚕豆和豌豆在生态上是配对的，两者都是冬季作物，而其差异在于豆粒的大小。词汇体系的变化必定受到这种语言外因素的制约，故蚕豆和豌豆应在词汇上也是配对的。根据地图反映出来的各种事实，我们假定指〈蚕豆〉的词和指〈豌豆〉的词分别曾形成南北对立：



地图 30 解说认为，浙江“佛豆”的前身是来自“胡豆”的“福豆”，而这些词后来也变成“福州豆”、“罗汉豆”等，下文以“佛豆”代表。

某一时期北方的“蚕豆/豌豆”侵入长江流域，在湖北、湖南与“胡豆/麦豆”冲突，在浙江与“佛豆/麦豆”冲突。这两种同义冲突的结果是，“豌豆”在湖北、湖南变指〈蚕豆〉，“蚕豆”在浙江变指〈豌豆〉。

以上两例明显具有共性，可以归纳如下：

- 1) 总地来看，北方方言有压倒长江方言的趋势，但长江方言与此抵抗。
- 2) 长江方言抵抗的方式无二致，即要保卫一对词 P(x)/Q(y)中的一个，而最终抛弃另一个。保卫的对象是 P(x)还是 Q(y)，这是由具体情况决定的。就〈走/跑〉义的词说，北部吴语以死守〈跑〉义的“走”为原则，是出于回避同音冲突的要求(参见地图 45 解说)，但为此抛弃了〈走〉义的“行”。就〈蚕豆/豌豆〉义的词说，湖北、湖南的方言以死守“麦豆”为原则，浙江的方言以死守〈蚕豆〉义的“佛豆”(或者也包括“福豆”、“福州豆”、“罗汉豆”等)为原则，因为对当地老百姓说，这些名称都是适合于表〈豌豆〉或〈蚕豆〉的，也就是嘉名(详见地图 32 解说)。与此相反，湖北、湖南指〈蚕豆〉的“胡豆”由于多少有点不吉利，以致被抛弃。在浙江，由于当地自古以来就有养蚕的传统，来自北方的“蚕豆”这一名称可谓是有吸引力的，故虽然“麦豆”也是嘉名(浙南地区的方言还保留此词)，但最终被抛弃了。
- 3) 作为侵入者的北方方言采取了一种战略上的妥协，即由于长江方言死守的词形阵地不易陷落，故把攻击的对象改为抵抗力相对微弱的词义范畴。

有一个问题是，北方的“蚕豆”和“豌豆”必定携手向南进攻，但“蚕豆”似乎在湖北、湖南的斗争中没起作用，“豌豆”似乎与浙江的斗争无关。这可能表明，方言的说话者只关心正在进行斗争的两个词，即〈跑〉义的“跑”和“走”、湖北、湖南〈豌豆〉义的“豌豆”和“麦豆”以及浙江〈蚕豆〉义的“蚕豆”和“佛豆”。

这些看似非常规的现象多出现在方言的边界附近，值得今后继续挖掘，以分析词汇变化的实际面貌。

以上所论皆为从似无规律性的诸种现象中找出规律性的尝试，是否妥当尚待今后语言地理学研究的进展来证明。

附记：此文定稿以前也承石汝杰、汪维辉两位先生提出不少宝贵意见，特此附记并表示由衷的谢意。

(岩田 礼)